

周雯婷, 刘云刚. 中国大城市外国人聚居区的形成机制——基于北上广的比较研究 [J]. 地理科学, 2022, 42(9): 1513-1521. [Zhou Wenting, Liu Yungang.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immigrant enclaves in China: Comparative study of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42(9): 1513-1521.] doi: 10.13249/j.cnki.sgs.2022.09.001

中国大城市外国人聚居区的形成机制 ——基于北上广的比较研究

周雯婷¹, 刘云刚^{2,3}

(1. 广州大学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2.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行政区划与空间治理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31; 3. 华南师范大学北斗研究院, 广东 佛山 528225)

摘要: 在 3 个典型的外国人聚居区——北京望京韩国人聚居区、上海古北日本人聚居区、广州小北非洲人聚居区的实证研究基础上, 探讨不同移民群体的城市选择偏好, 以及移民群体和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 在京韩国人以企业、商贸、教育指向型居多, 在沪日本人以企业指向型为主, 在穗非洲人以贸易指向型为主, 这一特征说明北上广不同的城市职能差异; 北上广的外国人聚居区均形成于相似的宏观制度环境, 生产活动的全球性重组、国家间关系、国家制度和外国人管理政策等因素共同影响了外国人聚居区在大城市的兴起, 但由于不同的城市软硬件环境与在华外国人的身份属性互动影响, 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外国人聚居区, 概括为耦合型(北京望京)、特区型(上海古北)和族裔型(广州小北)。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已进入引资(资本国际化)和引人(人口国际化)并进的新阶段, 应当进一步重视对大城市外国人聚居区的治理及服务的引导、规范, 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 推动中国对外开放深度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外国人聚居区; 韩国人; 日本人; 非洲人; 北上广

中图分类号: K9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22)09-1513-09

随着跨国劳动力迁移的常态化, 中国正逐渐变成跨国移民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既有研究表明, 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跨国移民主要集聚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1]。这一现象同样出现在中国, 不少城市内部已形成了以国籍或族裔为特征的外国人聚居区。然而, 由于不同城市的软硬件环境存在差异(如住房市场、经济产业结构、基本公共服务、城市历史文化、市民素质等), 导致不同城市在面对不同移民群体时受到的挑战和压力不同, 而城市的态度和响应反过来也会影响跨国移民的生存策略和日常生活实践。除了自身的固有属性外, 国家间关系、国家的宏观环境政策、城市的各要素等也对移民群体的生存策略和日常生活实践产生深刻影响, 这在中国的案例研究中尤其需要重视。

在上述背景下, 本文基于过去对 3 个典型外国人聚居区——北京望京韩国人聚居区、上海古北日本人聚居区、广州小北非洲人聚居区的实证研究, 分析不同移民群体的人口迁移模式、人口结构特征及其城市选择偏好, 比较其聚居区的特征和形成机制, 以揭示移民群体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单一城市的单一移民群体, 对在华外国人聚居区形成机制的解释难免偏颇片面。本文基于已有研究积累, 尝试进行多移民类型和多案例地的比较研究, 希望更好地归纳在华移民群体和城市的互动特征。以下, 首先分析宏观政策背景下移民群体的城市选择偏好, 其次探讨北上广三地外国人聚居区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21 世纪以来在华新移民现象是当今全球、国家、地方等多层级因素

收稿日期: 2021-12-20; **修订日期:** 2022-03-1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01190, 42071187, 4197118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8YJCZH271)资助。
[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1901190, 42071187, 41971183), Ministry of Educ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roject (18YJCZH271).]

作者简介: 周雯婷(1986-), 女, 广东茂名, 讲师, 硕导,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地理学、跨国移民研究。E-mail: lyzhouwt86@gzhu.edu.cn

通讯作者: 刘云刚。E-mail: ygliu@scau.edu.cn

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本文从宏观(全球和国家)、中观(城市)、微观(移民/族群)尺度上对在华外国人聚居区形成的外因和内因进行多尺度的探讨。

1 研究视角和方法

移民与城市的关系向来是城市社会地理学的研究重点。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某一移民群体在城市空间内部的聚居现象,揭示移民居住的空间分化和本地化问题。其后,逐渐构建了解释移民社区形成的三大理论框架:空间同化理论、地方分层理论和选择理论。三大理论均存在假设基础:移民群体处于主流社会中的弱势边缘地位,成员大多为低端移民或劳工移民。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移民群体的人口结构及其居住空间形态开始呈现出新的特征。新出现的移民社区,其构成主体不再局限于低端移民或劳工移民,也包括了跨国公司管理者、商贸技术人才、精英移民等社会中坚阶层组成的新移民群体。对比发现,传统移民社区的族裔群体属性较为单一,他们注重构建和维系由血缘、地缘关系组成的社会网络,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并投入到劳动密集型的经济活动中,形成对外封闭、对内团结的移民社区。而新型移民社区的族裔群体属性较为多元,通常是多个族裔群体混居在同一地区,他们更注重利用经济和人力资本,参与资本密集型的经济活动^[2,3]。新移民群体的出现导致其聚居空间突破了上述传统移民社区的研究范畴,传统的理论模型已难以解释这些新出现的移民社区现象。对比之下,中国本土的跨国移民研究方兴未艾,地理学领域的研究大多聚焦空间维度和种族维度,通过实地考察和问卷访谈等方法对在华外国人的居住空间分布、移民社区的空间形态、族裔经济活动的社会经济特征等展开研究,但较少对移民社区的空间形成机制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尝试从多移民类型多案例地比较来接近中国大城市外国人聚居区的形成机制问题。多移民类型或多案例地的比较研究,通过控制某一地理空间变量考察多个移民群体在同一移居国所扮演的角色,或者同一移民群体在多个地缘政治区域中的不同际遇,加入时间变量实现共时或历时的比较,有助于更好归纳总结移民群体的迁移活动和定居/居留活动的规律和特征^[4]。因此,本文选取了已有研究基础的北京望京韩国人聚居区、上海古北日本人聚居区、广州小北非洲人聚居区3个典型案例进行对

比研究,希望有助于理解在华外国人聚居区的演变及其与中国城市发展的关系,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城市国际化发展。

2 在华外国人的城市选择偏好

由于外国人管理政策的原因,大多在华外国人并不具备长期居留中国的客观现实条件。对于旅居属性占主导地位的在华外国人而言,适应并融入当地社会不是其日常生活的重心,如何快速适应当地生活、顺利开展业务活动或事业才是关注重点。这也是在华外国人主要集聚在大城市的原因。

2.1 韩国人的城市选择偏好和人口特征

根据韩国海外同胞统计显示,2013年长期居住在中国的韩国人已超过35万,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海外第三大韩国人移居国家。其中,人口规模超过2万人的省市依次为:北京(74 025人)、广东(51 902人)、青岛(45 321人)、天津(28 840人)、辽宁(24 237人)、威海(21 607人)和上海(20 412人)(<http://www.mofa.go.kr>)。环渤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东北三省的韩国人口空间集聚现象明显。尤其以北京为最,2003年已达4.3万人,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更是高达10万人,此后有所减少,现在基本保持在7万人左右^[5]。享有“小首尔”美誉的北京望京地区形成了6万左右人口规模的韩国人聚居区,也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外国人聚居区^[6]。

在京韩国人是经济较发达国家之间的迁移。前期研究发现,在京韩国人口的构成较为多元,包括:韩商(经商者、创业者)、韩干(韩国政府、韩资企业的派遣人员)、韩生(留学生)、韩太(韩商和韩干的夫人)、韩无(没有固定工作或收入的人)和韩工(打工者)6种类型,并以前3种类型的人口居多,也即企业指向型、商贸指向型和教育指向型特征较为明显^[6]。

2.2 日本人的城市选择偏好和人口特征

根据日本外务省颁布的《海外在留邦人数调查统计》(<https://www.mofa.go.jp/mofaj/toko/tokei/honjin/index.html>),在华日本人(本文特指“长期居留者”,意指在中国居留超过3个月,但没有永久居留权的日本人)20多年来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趋势,从1996年的43 879人增长至2016年的125 089人。在华日本人同样呈现特定大城市的空间集聚倾向。2016年人口规模超过5 000人的城市依次为:

上海(44 072 人)、香港(23 975 人)、北京(8 326 人)、广州(7 532 人)、苏州(6 656 人)、深圳(5 437 人)和大连(5 293 人)^[7]。其中, 被誉为“小东京”的古北地区的日本人聚居区也是上海市规模最大的外国人聚居区^[8]。

在沪日本人是经济发达国家到经济欠发达国家的迁移, 属于典型的“北南移民”。在沪日本人主要包括 3 种类型: 日本公司的派遣员及其家属(直接从日本派遣到上海工作)、当地录用者(个人在上海就业)、当地创业者(设立小资本企业或自营业店铺), 并以第一种类型的人口比重最大; 在沪日本人具有明显的企业指向型特征^[9]。

2.3 非洲人的城市选择偏好和人口特征

随着中非经贸关系的持续升温, 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华非洲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但由于缺乏官方统计数据, 其人口规模一直存在争议。Bodomo 及其研究团队指出, 在任意 12 个月的时间段内中国居住有 40~50 万非洲人, 其中贸易商达 30~40 万人^[10]。非洲人的流动性非常高, 往往在香港、广州、佛山、义乌等城市之间流转, 或者是在中国城市与其他国家之间频繁往来, 目的在于延长中国签证^[11,12]。这些研究均指出, 广州是在华非洲人最重要的集聚和贸易城市。在穗非洲人中, 除留学生外, 74.6% 持商务 F 签证, 12.1% 持旅游 L 签证, 而三元里和小北是非洲人较为集中居住的 2 个片区^[13]。三元里片区的主要是尼日利亚人, 小北片区以讲法语的非洲穆斯林居多^[12]。

在穗非洲人是经济不发达国家到经济较发达国家的迁移, 属于典型的“南南移民”。在穗非洲人更多从事非正式的、小型的跨国商贸活动, 从广州出口工业产品到非洲或从事其他相关商业, 小部分经营小商品, 向非洲出口衣服、个人商品、家庭用品等, 贸易指向型特征明显^[14]。

3 三大外国人聚居区的案例分析

3.1 北京望京的韩国人聚居区

望京韩国人聚居区的形成发展可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 2002 年: 中韩建交后韩国人开始进入北京, 教育资源丰富的花家地和采用韩式住宅设计的望京新城成为韩国留学生和其他韩国人的首选居住地; 第二阶段, 2003—2008 年: 望京科技园成立, 吸引了更多韩资企业的进驻, 稳固了望京新城作为韩国人聚居区的中心地

位, “韩生”也开始向该地转移; 第三阶段, 2009 年至今: 受金融危机爆发影响, 韩元贬值, 韩资企业、韩国投资者和创业者受到极大冲击, 聚居区出现以望京新城为中心, 向周边相对便宜住宅区扩散的趋势^[6]。韩国人注重居住空间的舒适性和便利性, 特别是社会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韩商和韩干, 倾向于选择靠近韩资公司集中的商务区、居住环境较为安静和舒适的门禁社区, 这也符合和延续了他们在韩国时的居住习惯。尽管望京新城并非涉外居住区, 但其位于涉外资源丰富的朝阳区, 附近有不少外交公寓、外国领事馆和涉外宾馆等。在外交公寓数量有限且租金昂贵的前提下, 地理位置相近、韩式设计且租金相对便宜的望京新城就成为外交公寓的理想替代品。而望京新城在规划之初也充分考虑了不断增多的外国人的居住需求, 积极定位为“国际化社区”。可见, 韩国人在望京新城的聚居, 背后离不开当地政府和投资开发商的引导和支持。

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和国际政治文化交流中心的城市特性, 从经济层面(发展机会多、韩资重点投资对象)和文化层面(传统文化相近、教育资源丰富)吸引了“企业指向型”和“教育指向型”的韩国人。进入北京后, 拥有优质教育资源和望京科技园, 且距离首都机场和市中心仅为 10 km 的望京地区, 就成为韩国人理想的居住区。此外, 韩国人对本族裔商品和服务持有强烈的需求, 居住区或徒步圈内是否分布有族裔经济设施也是其择居时着重考虑的因素。族裔经济设施以聚居区为中心形成空间集聚效应, 带动了更多韩国人的居住, 不仅加强了聚居区的居住功能和(族裔)商业功能, 也推动了聚居区范围以望京新城为中心向外围地区的扩散, 呈现出了“大聚居, 小分散”的居住空间格局。但望京案例有其特殊性——韩国人聚居区的构成主体除了韩国人外, 还包括中国朝鲜族。中国朝鲜族不仅在居住空间上靠近韩国人, 也积极参与经营和消费韩国人族裔经济。正是由于中国朝鲜族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支持, 韩国人相比其他移民群体能更快适应当地社会, 社会融合程度较高, 从而形成了半封闭半开放式的韩国人聚居区。

3.2 上海古北的日本人聚居区

古北日本人聚居区的形成发展可分为 2 个阶段。第一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至 2002 年: 上海作为日资在华的重点投资城市, 带动了日本人跟随日资企业的迁移, 并居住在指定的涉外居住区的

古北新区;第二阶段,2003年至今:随着外国人定居政策的解除,古北新区由于原本居住的日本人口较多,日式的生活环境氛围浓厚,在后续发展过程中逐步演变成日本人聚居区^[9]。日资企业在日本人聚居区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前期,日资企业大多采取为派遣员提供社宅(公司租下的公寓宿舍),或者是负担一定比例的房租和孩子教育费用等福利措施。因此,派遣员往往选择居住在通勤方便、地理位置良好、能提供往返日本人学校校车、周围分布有较多族裔经济设施、安全和高级的国际化门禁社区^[9]。古北新区作为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配套设施,规划完善先进,加上靠近日本领事馆和日本人学校的地理优势,符合作为日资企业的社宅以及派遣员的居住需求,从而稳固了作为日本人主要居住区的地位。而对当地政府和管理部门而言,古北新区原本就是为解决外国专家和港澳同胞的居住问题而规划的涉外居住区。在沪日本人的入住既符合古北新区的规划目的,又便于当地政府的移民管理。

上海拥有众多跨国公司的金融和经济中心的城市特性,是日资在华的重点投资对象,带动了“企业指向型”的日本人赴沪发展。进入上海后,以当地政府和投资开发商为代表的地方需求,与以日资企业为代表的日方需求达成一致,从而奠定了古北新区作为日本人聚居区的中心片区的地位,并由于日本人社会内部较强的封闭性而形成较为明显的聚居区边界。同时,日本人出于强烈的文化和身份认同,普遍存在维持母国生活方式的倾向,对族裔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较高。这种特殊需求与当地提供的标准化服务存在差异,特别是提供者需要拥有特定的技能、语言能力、服务接待方式、共同的价值观等,这不是当地人所能提供的,因此促进了为日本人服务的族裔经济设施在聚居空间内的集聚和发展。这不仅加强了聚居区的族裔商业功能,也刺激了居住功能的进一步强化,居住人口的增加也推动了聚居区边界以古北新区为中心向外围区域的扩张。但对族裔商品和服务的依赖也导致了在沪日本人的社会融合意愿和融合程度较低^[15]。

3.3 广州小北的非洲人聚居区

小北非洲人聚居区的形成发展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003年:非洲人受金融危机影响开始从香港、曼谷、吉隆坡等地迁移到广州;第二阶段,2004—2007年:小北和

三元里逐渐成为广州“巧克力城”的核心片区;第三阶段,2008年至今:由于移民管理政策收紧,核心片区发展放缓,黄岐、东圃、黄石和番禺等地的非洲人口开始增长^[16,17]。非洲人聚居区的边界出现了从中心片区向外围片区分散的趋势,同时中心片区的居住功能逐渐减弱,贸易功能不断加强。究其原因,首先,受社会经济属性的限制,大多数在穗非洲人在选择居住空间时更看重租金水平以及到达各大批发市场的便利程度,倾向于选择靠近批发市场和交通枢纽的商品住宅区甚至是城中村,少部分人选择较为便宜的酒店宾馆。但2008年后房租不断上涨,加上广州开始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导致有合法签证的非洲人被迫去租住更为昂贵的商品住宅区,无合法居留权的非洲人不得不搬到黄岐等城乡结合部。其次,中心片区的小北和三元里缺乏国际学校等教育资源,而周边的公办学校不招收外国学生,也推动了带着非洲人搬至国际教育资源较为丰富的番禺等地。而新闻媒体对非洲人违法犯罪等事件的相关报道,也极大影响了当地居民和管理部门对非洲人的负面印象,导致部分居民和物业管理者通过调高租金、强制拒租等措施,限制非洲人的入住或强迫其搬离该地,导致当地住房市场表现出排斥非洲人的特征^[14]。再者,小北地区靠近两大清真寺(先贤寺和怀圣寺),符合穆斯林靠近伊斯兰寺庙居住的传统^[18]。中心片区的贸易批发市场和两大清真寺,发挥节点作用将不同片区的非洲人联结在一起,从而构建了在穗非洲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维持了非洲人聚居区的“形散神聚”。这也与在穗非洲人来自众多非洲国家、使用多种语言、多民族混居的特征有关。

广州作为与亚非拉等新兴市场交往频繁的对外贸易中心的城市特性,是吸引“贸易指向型”的非洲人迁移广州的首位因素。进入广州后,贸易批发市场和清真寺的地理区位、城市管理政策的松紧变化、非裔儿童教育的可达性、与当地居民的交往和排斥等,共同影响了非洲人聚居区的形成和演变。在穗非洲人对族裔经济设施的依赖程度也较高,除了制度性保障缺失的影响外,宗教信仰和以清真饮食为主的生活习惯也是关键的影响因素。在穗非洲人的族裔经济设施更多分布在贸易场所的各大批发市场附近,这既与他们的居住空间相对分散、没有形成边界较为明显的聚居区有关,同时也体现了其生活重心以贸易活动为主的特性。

4 结论与讨论

4.1 讨论

3 个外国人群体及其聚居区的对比可总结如表 1 所示。

1) 外国人聚居区的形成机制。从宏观层面来看, 跨国移民的迁移动机、迁移行为以及迁移结果都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的背景下, 受到生产活动的全球性重组、国家间关系、国家制度和外国人管理政策等因素的深远影响。首先, 在跨国生产要素流动和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 北京和上海进驻了众多跨国企业和机构, 广州成为出口加工企业高度集聚的世界工厂, 这是跨国移民流向中国三大城市的国际环境。其次, 日本和韩国都位列中国十大贸易伙伴之列, 中非经贸关系也在不断升温, 经济交流带动的移民跨国迁移越发频繁。但中日关系时常政冷经热、中韩关系也因萨德事件蒙上阴影, 国家间关系的细微变化, 都直接对跨国移民的在华生活实践产生较大影响, 加剧了移民同胞之间抱团而居的倾向。而中国作为传统的非移民国家, 户籍制度、外国人管理政策等将跨国移民排除在住房、医疗和教育体制之外。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时的外国人定点居住政策, 以及为方便移民管理和招商引资等目的兴建的涉外居住区、国际化社区等, 成为多数在华外国人聚居区形成的源头。

从中观层面来看, 城市的软硬件环境极大地影响了外国人聚居区的形成过程和特征。首先, 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产业结构, 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城市所吸引的移民群体。北京是离韩国最近的

国际化大都市, 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 对同处儒家文化圈、国土狭小的韩国人具有天然的吸引力; 上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是日本人海外投资和移居的重要城市, 在人口高峰期时曾有 10 万日本人生活在上海的租界, 上海对日本人而言是非常熟悉和有感情的城市^[19]; 广州自清代“十三行”设立以来就承载了全中国的出口贸易功能, 对外来文化包容, 毗邻港澳, 加上 1957 年起每年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等, 都对非洲商人极具吸引力。其次, 城市在招商引资和移民治理方面的相关政策, 都不可避免对当地的住房市场以及移民群体的居住模式产生较大影响, 具体体现在为中高端移民提供居住条件良好的涉外居住区或国际化社区, 中低端移民则往往无法享受类似的住房资源, 甚至可能被排除在住房市场之外。再者, 当地居民的态度, 特别是因移民身份或国家间关系和事件等而引起的风波, 都会导致当地居民表现出不同的情绪和行为。

从微观层面来看, 在华外国人都带有强烈的过客色彩, 人口流动性高, 经济目的性强, 自身缺乏主动融入当地社会的意愿, 再加上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着种种障碍壁垒, 如语言障碍、对当地环境和社会背景缺乏足够的认识等, 都导致外国人聚居区带有旅居性和封闭性的共同特征。旅居性表现为日常生活活动大多保持母国的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 封闭性表现为同胞聚居, 局限于同族裔群体之间的交往, 与当地社会的交流相对匮乏, 日常生活依赖于族裔经济体系。这些特征不同程度上抑制了跨国移民获取城市资源的机会, 减弱了他们与当地社会的互动。

表 1 北上广外国人群体及其聚居区的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n ethnic groups and enclaves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典型聚居区	北京望京	上海古北	广州小北
聚居区类型	耦合型	特区型	族裔型
移民群体	韩国人	日本人	非洲人
签证类型	工作Z签证、留学X签证	工作Z签证	商务F签证
从事行业	韩企(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	日企(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	商贸活动
居住需求	环境好、安全、工作便利	安全、工作便利	低租金、贸易便利
族裔经济需求	维持母国生活方式和较高水准的生活质量		宗教信仰, 饮食习惯, 减少冲突矛盾
聚居区边界	边界较为明显, 半封闭	边界明显, 封闭性强	边界松散, 开放式
边界变化	中心向外围扩散	中心向外围扩张	中心向外围分散转移
居住地区位	靠近韩企集聚地	靠近日企集聚地	靠近贸易批发市场
与本地居民关系	与中国朝鲜族交往密切	少接触、少交往	排斥、歧视

2) 外国人聚居区的特征。① 地理位置优越。根据选择-限制的解釋模式, 选择理论体现了以族裔性和文化偏好为基础的、自我隔离的聚居模式, 限制理论则强调少数民族群面临的各种制约^[20, 21]。1985 年中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 20 世纪 90 年代进入中国的外国人主要是政府和企业机构的派遣人员、留学生、投资者等特定群体, 他们定点居住在国外专家楼、外交公寓、留学生宿舍和涉外宾馆等^[22]。由于外国人在居住地选择方面受到外国人管理政策的明显制约, 导致外国人聚居区大多形成于特定的政策区域。如北京望京的韩国人聚居区形成于拥有众多涉外酒店、外交公寓和领事馆的朝阳区, 上海古北的日本人聚居区形成于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配套设施的涉外居住区, 广州小北的非洲人聚居区在形成初期时也是靠近拥有众多涉外酒店的越秀区。21 世纪后, 随着外国人定点居住政策的解除, 外国人与当地居民的居住隔离现象才开始缓和。可见, 与西方的移民社区不同, 在华外国人聚居区的空间区位并非自我选择的结果, 而是国家制度和外国人管理政策限制下的产物, 这些聚居区大多位于市中心或 CBD(中央商务中心) 等优越区位, 像古北和望京更是被誉为先进的国际化社区。② 普遍形成自我服务的聚居区族裔经济。根据社会-经济的解釋模式, 制度性的歧视, 特别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备程度与覆盖范围, 住房市场、劳动力市场、医疗教育系统对少数民族群的开放和接纳程度等, 都对聚居区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23]。在中国, 由于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拥有中国户籍的居民, 外国人只能采取族裔经济的方式应对日常生活的需求。例如, 上海和广州的日本人族裔经济具有自我服务、本地根植的特点^[8, 24]。北京和广州的韩国人族裔经济具有韩国人和中国朝鲜族共同经营, 自我服务为主的特点^[6, 25]。而广州的非洲人族裔经济设施是构成非洲人生活文化共同体的重要要素^[26]。正是由于各城市的族裔经济以外国人聚居区为空间依托, 并进一步发展成为聚居区族裔经济, 外国人聚居区才得以持续发展。③ 具有较为明显的封闭性。根据文化-族群的解釋模式, 少数民族群基于自身的发展需求往往选择同胞聚居, 形成维护文化认同的族群认同理论、获取族群资源的族群资源理论, 和应对主体族群的歧视和偏见的庇护所理论等^[27, 28]。非洲人的低成本发展的自我选择、抵御来自当地社会的排斥、强化当地社

会联系和分享信息等需求, 共同导致了非洲人聚居区的封闭性^[14]。日本人对安全、高质量生活的追求阻碍了他们与当地社会建立紧密的联系^[29], 中日关系的复杂变化以及双方缺乏互信和理解等问题, 也加剧了日本人聚居区的封闭性^[9]。而韩国人聚居区的封闭性弱于上述两者, 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朝鲜族在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中介和援助的作用^[6, 25]。在传统的西方移民社区研究中, 少数民族群的居住隔离被视为社会剥夺或空间失调而引发的社会问题^[30], 其封闭性是由于少数民族群难以进入主流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和经济体系而引起。而中国的外国人聚居区的封闭性更多是基于自我认同的选择, 并非是社会剥夺或空间失调的结果。

3) 外国人聚居区的类型。① 特区型。上海古北的日本人聚居区, 原本是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配套设施的涉外居住区。古北的日本人聚居区属于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政策设计形成的外国人聚居区, 是在外国人管理政策指定外国人定点居住的时代背景下, 当地政府和资本(投资开发商)等主体力量积极引导和建设的、代表城市发展现代化水平的国际化社区。而代表跨国主体力量的日企也在这一过程中积极配合, 通过指定社宅或住房补贴福利的方式引导日本人入住古北新区。像古北这种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以政策制度和当地政府等为代表的行政力量发挥主导作用的聚居区, 本文将其定义为“特区型”外国人聚居区。② 耦合型。北京望京的韩国人聚居区在初期时也带有自上而下的政策设计形成的特征。但在中后期, 投资开发商出于对未来韩国人增多的前景预判而展开住宅区的建设, 特别是通过韩式设计的住宅来吸引韩国人入住, 而当地政府在此方面发挥的作用较弱。随着韩国人社会经济属性的多样化、居留时间变长、对当地社会更为熟悉后, 部分韩国人出于经济、教育、便利性等原因开始搬迁到望京新城附近的中国人住宅区, 从而推动了聚居区边界向外围扩张。因此, 像望京这种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既有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 又有自下而上的族裔群体自发推动的聚居区, 本文将其定义为“耦合型”外国人聚居区。③ 族裔型。广州小北的非洲人聚居区是自下而上的社会(族裔群体)力量自发主导形成的典型代表, 本文将其定义为“族裔型”外国人聚居区。“族裔型”的发展模式更类似于以地缘、血缘等社会关系为纽带、依附特定社会空间而发展形成的国内移民聚居区。相比望京和古北案例中的居住环

境良好的商品住宅区, 非洲人主要居住在租金较低和环境一般的商住楼, 甚至是城中村中的握手楼。当地政府和投资开发商不但没有参与其形成发展, 反而随着在穗非洲人口的增加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被不断夸大, 当地政府的态度逐渐转变为消极的严格管控。同时, 当地居民对非洲人的聚居多持抵触态度, 部分商住楼和社区采取调高租金、强制拒租等措施限制非洲人的入住^[14]。因此, 非洲人聚居区的形成, 既有族群自身的聚居偏好, 也有当地社会和居民的排外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4.2 结论

中国的外国人聚居区的兴起, 首先都不同程度上受到全球经济重组、中国外国人管理政策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限制和影响, 但在后续发展过程中, 外国人群体的身份属性及其所处城市的性格差异, 赋予了其不同的形成过程和特征。譬如, 在京韩国人以企业、商贸、教育指向型居多, 在沪日本人以企业指向型为主, 在穗非洲人以贸易指向型为主, 这一特征说明北上广不同的城市职能差异。中国的外国人聚居区, 普遍具有地理位置优越、形成自我服务的聚居区族裔经济、具有较为明显的封闭性等特征, 并可以概括为耦合型(北京望京)、特区型(上海古北)和族裔型(广州小北)3 种类型。前两类即特区型和耦合型都有政策和资本的支持, 是代表城市发展现代化水平的国际化社区。这些聚居区的形成并非当地住房市场的歧视, 而是由于这两个移民群体中外资外企的相关人员、经商者、创业者占主体地位, 他们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既符合当地政府推进的国际化城市的发展策略, 也符合资本开发商打造高端国际化社区的目标, 再加上这两个移民群体出于居住安全和优质社区服务的考虑, 往往也配合政府政策以及资本开发商的安排和引导, 成为国际化社区的主要住户。北京望京和上海古北的外国人聚居区, 它们在形成时与政府推动的依靠高科技、大公司和国外资本的城市发展模式相吻合, 可谓政府、资本、社会力量三者目标一致、共同合作的产物。而族裔型聚居区, 虽然与西方有类似特征, 但也并非西方那样的贫困区。

4.3 展望

在当前的中国国情和“旅居型”移民的背景下, 这些外国人聚居区是对现有的国际大环境、外国人管理政策、城市政策以及设施服务供给现状逐渐适应的结果。因此, 中国的跨国移民研究需立足于中

国背景, 考虑国家制度、经济体制、市场转轨、社会结构转型等各层面因素的影响, 由此衍生的诸如社会融合和隔离、城市空间转型、移民治理甚至是新国际关系等问题也是后续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在后疫情时代, 外国人群体的跨国迁移变化以及在华外国人聚居区的后续发展演变等, 都是进一步值得关注的课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Caglar A. Urban migration trend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R].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5: Migrants and cities: New partnerships to manage mobility. Switzerl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15.
- [2] 周敏, 林闽钢. 族裔资本与美国华人移民社区的转型[J]. 社会学研究, 2004(3): 36-46. [Zhou Min, Lin Mingang. A study on ethnic capita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migrant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4(3): 36-46.]
- [3] 周敏, 黎相宜. 国际移民研究的理论回顾及未来展望[J]. 东南亚研究, 2012(6): 56-62. [Zhou Min, Li Xiangyi. Overview of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future trends.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2(6): 56-62.]
- [4] 周大鸣, 周爱华. 广州非洲和韩国商贸型移民的比较[M]// 王辉耀, 苗绿.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88-106. [Zhou Daming, Zhou Aihua. A comparative study on African merchants and Korean merchants in Guangzhou. Wang Huiyao, Miao Lyu. Annual report on Chines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18).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8: 88-106.]
- [5] 교육과학기술부. 재외동포현황동북아시아·남아시아태평양·북미·중남미·유럽·아프리카·중동[EB/OL]. <http://www.mofa.go.kr>. 2015-10-20.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South Korea. Annual report of statistics on Korean nationals overseas 2013: Northeast Asia, South Asia Pacific, North America, South America, Europe, Africa, Middle East. <http://www.mofa.go.kr>. 2015-10-20.]
- [6] 周雯婷, 刘云刚, 全志英. 全球化背景下在华韩国人族裔聚居区的形成与发展演变: 以北京望京为例[J]. 地理学报, 2016, 71(4): 649-665. [Zhou Wenting, Liu Yungang, Jeon Jiyoung. Making,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Korean Enclave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Wangjing, Beijing.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4): 649-665.]
- [7] 日本外务省. 海外在留邦人数调查统计(平成28年)[EB/OL].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93757.pdf>, 2018-3-7. [Consular and Migration Policy Division, Consular Affairs Bureau, 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nual report of statistics on Japanese nationals overseas 2016. <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93757.pdf>, 2018-3-7.]
- [8] 周雯婷, 刘云刚. 上海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

- 特征[J]. 地理研究, 2015, 34(11): 1-16. [Zhou Wenting, Liu Yunga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apanese ethnic economy in the Gubei Japanese enclave of Shanghai City,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11): 1-16.]
- [9] 周雯婷. 上海における日本人集住地域の形成・変容過程: 古北区を事例として[J]. *地理学評論*, 2014, 87(3): 183-204. [Zhou Wenting.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cesses of a Japanese enclave in Shanghai: Case study of the Gubei area. *Geographical Review of Japan Series A*, 2014, 87(3): 183-204.]
- [10] Bodomo A. Africans in China: A sociocultural stud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Africa-China relations[J]. Cambria Press, 2012, 21(212): 1133-1135.
- [11] Brown A. In the Dragon's Den: African traders in Guangzhou[J]. *Journal of Ethnic & Migration Studies*, 2012, 38(5): 869-888.
- [12] Haugen H Ø. Nigerians in China: A second state of immobility[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12, 50(2): 65-80.
- [13] 李志刚, 杜枫. 中国大城市的外国人“族裔经济区”研究: 对广州“巧克力城”的实证[J]. *人文地理*, 2012, 27(6): 7-12. [Li Zhigang, Du Feng. The transnational making of 'chocolate city' in Guangzhou. *Human Geography*, 2012, 27(6): 7-12.]
- [14] 李志刚, 薛德升, Michael Lyons, 等. 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J]. *地理学报*, 2008, 63(2): 207-218. [Li Zhigang, Xue Desheng, Lyons M et al. The African enclave of Guangzhou: A case study of Xiaobeil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8, 63(2): 207-218.]
- [15] 周雯婷, 刘云刚. 在华外国人社会融合的现状与问题——以在沪日本人为例[J]. *世界地理研究*, 2019, 28(1): 1-12. [Zhou Wenting, Liu Yungang. The condition and problems of im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Japanese transmigrants in Shanghai.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9, 28(1): 1-12.]
- [16] 梁玉成. 在广州的非洲裔移民行为的因果机制: 积累因果视野下的移民行为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3, 1: 134-159. [Liang Yucheng. African immigration in Guangzhou China: A cumulative causation perspective on immigration behavior. *Sociological Study*, 2013, 1: 134-159.]
- [17] 柳林, 梁玉成, 宋广文, 等. 在粤非洲人的迁居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来自广州、佛山市的调查[J]. *中国人口科学*, 2015, 1: 115-122. [Liu Lin, Liang Yucheng, Song Guangwen et al. Migration pattern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frican Immigran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 survey form Guangzhou and Foshan Cities.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5, 1: 115-122.]
- [18] 许涛. 在华非洲族裔聚居区的类型、特征及其管理启示: 以广州地区为例[J]. *非洲研究*, 2016, 2: 182-195, 270-271. [Xu Tao. Types, features and implications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African communiti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African Studies*, 2016, 2: 182-195, 270-271.]
- [19] 陈祖恩. 寻访东洋人: 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1868-1945)[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2-3. [Chen Zu'en. Looking for the Japanese in Shanghai from 1868 to 1945. Shanghai: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7: 2-3.]
- [20] Lewis P. Islamic Britain: Religion, politics and identity among British Muslims[M]. London: I. B. Tauris, 1994.
- [21] Smith S.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residence: Citizenship, segregation and white supremacy in Britain[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89, 15(4): 414-445.
- [22] Brady A M. Making the foreign serve China: Managing foreigne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M].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 [23] Musterd S, Winter M D. Conditions for spatial segregation: Some European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8, 22(4): 665-673.
- [24] 刘云刚, 陈跃. 广州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形成及其社会空间特征[J]. *地理学报*, 2014, 69(10): 1533-1546. [Liu Yungang, Chen Yue. Global economy, local landscape: Study on the ethnic economy of Japanese expatriates in Guangzhou Cit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10): 1533-1546.]
- [25] 刘云刚, 周雯婷, 黄徐璐, 等. 全球化背景下在华跨国移民社区的空间生产: 广州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的案例研究[J]. *地理科学*, 2017, 37(7): 976-986. [Liu Yungang, Zhou Wenting, Huang Xulu et al. Production of space of South Korean enclave in Yuanjing Road, Guangzhou.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7): 976-986.]
- [26] 王亮. 全球化背景下在华非洲人社区的生成及演进路径: 以广州小北非洲人社区为例[J]. *青海民族研究*, 2017, 28(2): 1-5. [Wang Liang. The formed path of the African community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Qinghai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7, 28(2): 1-5.]
- [27] Clark W A V. Residential preferences and neighbourhood racial segregation: A text of the schelling segregation model[J]. *Demography*, 1991, 28(1): 1-19.
- [28] Kempen R V. Escaping poverty neighborhoods in the Netherlands[J]. *Housing Theory and Society*, 2003, 20(4): 209-222.
- [29] 刘云刚, 谭宇文, 周雯婷. 广州日本移民的生活活动与生活空间[J]. *地理学报*, 2010, 65(10): 1173-1186. [Liu Yungang, Tan Yuwen, Zhou Wenting. Japanese expatriates in Guangzhou City: The activity and living spa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0, 65(10): 1173-1186.]
- [30] 郝亚明. 城市与移民: 西方族际居住隔离研究述论[J]. *民族研究*, 2012(6): 12-24. [Hao Yaming. City and immigrant: A summary of Western researches about the ethnic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Ethno-National Studies*, 2012(6): 12-24.]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Immigrant Enclaves in China: Comparative Study of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Zhou Wenting¹, Liu Yungang^{2,3}

(1. 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Guangdong,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 the Center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nd Spatial Governa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Guangdong, China; 3. Beidou Research Institut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Foshan 528225,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high-speed economic growth, the number of transmigrants in China has soared over the last decade. Though most of the transmigrants tend to sojourn for less than five years in major metropolises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their emergence gradually contributes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urban social space in China. Now, due to transmigrants' preference for residing close to their compatriots, scattered immigrant enclaves in major metropolises are becoming characterized by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or nations. This topic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and the public. As such, this study sheds light on three typical immigrant enclaves as case study regions, including the South Korean enclave in Wangjing, Beijing, the Japanese enclave in Gubei, Shanghai and the African enclave in Xiaobei, Guangzhou,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How and why have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chosen their residence city? 2) How do ethnic groups interact with residence cities, and what ar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immigrant enclaves?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hree immigrant enclaves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we found that: Firstly, many of the South Korean Transmigrants have expatriated to Beijing are enterprise-oriented, trade-oriented and education-oriented, the Japanese Transmigrants in Shanghai are enterprise-oriented, and the African Transmigrants in Guangzhou are trade-oriented. Secondly, the immigrant enclaves in three citi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under similar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s, such as global economic restructuring,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immigrant policy of China, which led to a policy-led or economy-led character of immigrant enclaves. Despite all this, due to distinct urban hard and soft environment, and ethnicity factor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immigrant enclaves vary from city to city, from ethnic group to ethnic group. As a result, there are three immigrant enclave models: The Japanese enclave in Gubei is the special zone model, the South Korean enclave in Wangjing is the coupled modes, and the African enclave in Xiaobei is the ethnic model. Besides, the study also points out that immigrant enclaves in China are different from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west, where they are usually treated as a serious social problem brought by social deprivation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gainst the contexts of China's unique situation and "sojourning" transmigrants, the immigrant enclaves in China are the results of transmigrants' efforts on adapting to China's immigrant policies, urban policies, and city's public services. Now, the cities in China have entered a new stage, featured by both capital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mmigrant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a completely distinct way. Therefore, we should put emphasis on the immigrant enclave governance and service, so as to build an exemplary role in the country and promote the in-depth opening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 words: immigrant enclave; South Korean Transmigrants; Japanese Transmigrants; African Transmigrants;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